

核心阅读

我们党早期虽没有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提法，但从严治党的理念已经付诸实践，尤其是在思想教育、干部管理、党内政治生活、改进作风、惩治腐败等方面的宝贵思想与经验，对当前全面从严治党仍有借鉴意义。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创建者和领导者，在领导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积累了丰富的党建思想理论与实践经验。当时，中国共产党虽没有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提法，但从严治党的理念已经付诸实践。这些宝贵的思想与经验，对当前全面从严治党仍有借鉴作用。

坚持思想建党，思想教育从严

党成立后，各种社会成分的人纷纷加入，尤其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据了党员中的大多数。他们在党内接受先进思想的同时，也会遭受各种错误思想的侵害与腐蚀，严重影响着党的先进性。“党内最本质的矛盾，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有鉴于此，解决党员的思想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提出，增强全党的理论水平，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务必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掌握其基本原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全党干部加入到教育学习这个大大活动中来，使马克思主义基

中国共产党早期从严治党的探索与实践

□ 李成林

本原理更加中国化，使全党的理论化水平总体得到提升。

正是因为我们党将思想建党放在第一位，一以贯之与各种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强化学习意识，加紧思想教育，从而使各种出身的党员成为了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新党员，并在革命实践中锻炼成为有阶级觉悟的、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的战士。

纯洁党的队伍，干部管理从严

中国共产党向来十分重视党的队伍建设，强调既面向党员整体，又凸显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与培养。

革命战争时期，不断壮大党员队伍是党组织建设最为迫切的需要。为此，毛泽东为新党员的发展设立了严格的制度门槛，要求发展新党员务必严格遵循党章要求，并重点强调：“我们共产党不是谁想入就能入，党章规定要经过支部大会表决通过，入党是有条件的。”有效抑制和消除了一些投机分子的不良入党动机，在源头上为从严治党创造了良好的党内环境。在《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我们党明确提出：“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明确指明了吸收新党员是以个体发展为标准，不能仅仅看社会成分，从而使大量有志向的人加入共产党，为革命成功奠定了组织基础，同时通过入党限制和教育，纯洁了党的队伍。

在培育优秀党员干部方面，毛泽东坚持高标准的选拔原则，主张“任人唯贤”，要求党员干部不仅要德才兼

备，更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充分体现了对党员干部的严格要求。他在《论新阶段》中明确指出，在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有两条路线，一个是正确的“‘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错误的‘任人唯亲’的路线，这两条道路是完全不同的、对立的，是会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向不同方向发展的”。走“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同时还应当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其中“德”就是坚定不移地践行党的路线，执行党的各项标准制度，恪守党的纪律，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才”便是有独立思考和工作本领，自力更生，踏实肯干。这里强调把二者结合起来，党员干部兼备德与才，才能使党的干部队伍建设获得全新的发展。

坚持民主集中制，党内政治生活从严

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指出：“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通过制定严密的议事决策程序，特别是在决策程序中严格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从而避免决策中的随意性或“拍脑袋决策”，防止决策中搞个人专断、“家长制”等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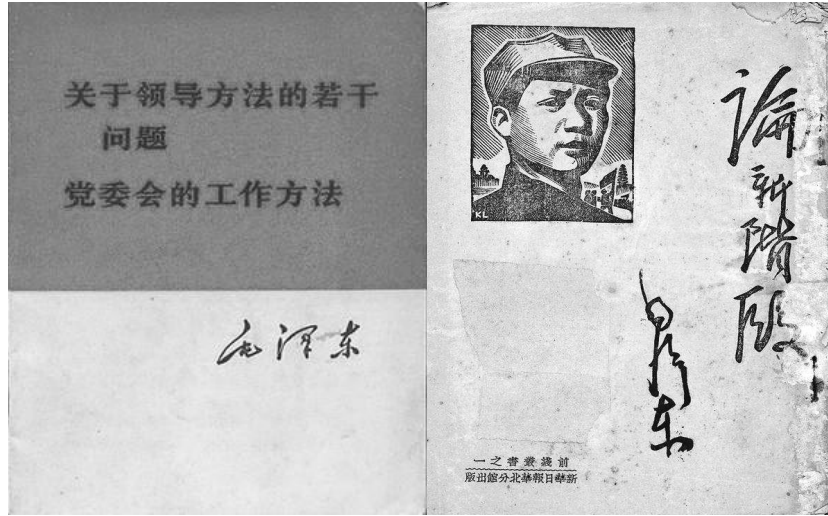
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刘少奇首次概括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即“四个服从”原则：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领导。这是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精辟概括，所有党员不管是

领导干部还是普通党员，都必须无条件地绝对执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与普通党员相配合，才能有完整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下，协调配合好各方面的关系，对加强党内团结，提高党的工作质量和效率，避免矛盾和冲突具有重要意义。总之，党的集中制建立在民主制的基础上，不能摆脱民主空口说集中，集中制也不是个人独裁、专横统治；党内民主是集中领导下的民主，不是极端民主化和无条件的自由化，更不是党内的无政府状态。可见，当时党的领导人已对民主集中制下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有了系统深入的了解，不能将它们分开、对立起来，而应该把它们有机统一起来。由此看出，这个时期党内民主集中制理论已经比较成熟了，许多内容至今仍为我们党所坚持。

培育优良作风，改进作风从严

我们党始终强调党的作风建设，坚持发扬民主作风，要求全体党员干部面向全体人民群众吸纳意见和建议，改变“家长制”作风，充分落实民主要求。延安整风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之所以能够在党内产生深远影响、修正党内出现的不正之风，就是因为我们认真地系统地贯彻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要发扬正确的批评，反对不正确的批评，这就是整风”。正是贯彻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反省中传播了民主作风，确保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顺利进行，减少了决策失误。

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了“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



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成为全体党员干部统一奉行的行为标准。新中国成立前，为了经受党的作风建设新的考验，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坚持“两个务必”的要求，为预防党员干部思想失守、防范党员干部作风下滑、肃清不良作风、维护党组织内部的生态环境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健全法制，惩治腐败从严

我们党十分重视惩治腐败，在严惩党内腐败问题上，突出了法治的重要性，并领导全党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维护党员干部清正廉洁的规章制度。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26号——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等。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反

腐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党内贪腐的扩展。

为了更进一步严惩腐败，保持党员干部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我们党组织构建了党内外监督机制，面向全社会鼓励人民群众加强对党员干部工作的监督。毛泽东曾多次警示党员干部：“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更遵循依法治党的原则提出：“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这些做法，在今天对巩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实现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有着深远的借鉴、启迪意义。



进一步提升红色教育基地作用

□ 陈 茜

红色教育基地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以实物、实景、实例、实事为载体，通过充分挖掘和开发红色资源，搭建党性教育大课堂，可以使领导干部在与历史事件、革命人物、革命精神的对话中，不断进行触及思想、深入灵魂的反思与感悟，实现心灵的震撼和精神的蜕变，不断增强党性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延伸党性教育课堂

主题鲜明、特色突出、感染力强的红色教育基地让党性教育变得具象化。如党的一些重要会议遗址等，那些重要的历史资料和珍贵的历史图片，向大家讲述中国共产党从苦难中塑造辉煌的革命史，以史育人、以文化人；在先进人物事迹陈列馆中感受优秀人物的成长历程和奋斗足迹，以史鉴人、以情动人；在肃穆的烈士陵园中重温革命者短暂且辉煌的人生履历，以史感人、以泪催人。这些都让党员干部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党性教育，使党性教育变为可视的精神和可触的信仰。现场教学是党性教育的有效教学方式，具有情境体验、直观生动的鲜明特点，最大亮点和优势在于“体验式”，带入感强。红色教育基地正好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这种功效，用活红色资源，让真实的历史现场变成现实的课题，把真实的历史事件变成鲜活的教材，在“故地重游”“情景再现”中实现理论与现实的结合、思想与情感的交流、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在所设定的特定历史空间中更有利于党员干部实现思想的升华和灵魂的碰撞。

拓宽党性教育视野

红色教育基地是进行党性教育培训的鲜明特色和最大优势，可以把红色传承作为使命担当，用党的光辉历程、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来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红色教育基



地中关于党的历史的内容，记录着我们党从诞生、发展到壮大的光辉历程，承载着无数先烈的崇高精神和历史荣光，是增强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筑牢宗旨意识的有效途径。红色精神中的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中国革命精神，是党史党建作风方面的“富矿”，更是加强作风建设和廉政教育的有效载体。通过这些富含红色基因的文化历史和革命精神，拓展党性教育的载体和途径，可以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汲取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这些正是党性教育最好的教科书。立足红色教育基地的资源禀赋，深挖红色文化内涵，重视源头梳理和内涵挖掘，注重理论研究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积极探寻红色教育基地在党员干部党性教育中的实现路径，充分挖掘红色资源蕴含的教育价值和育人功能，将红色资源有效转化为党性教育的教学资源，培植红色教育基地产业，形成党性教育特色，着力打造党性教育品牌。

增强党性教育深度

通过红色教育基地，建立起历史与现实联系的通道，拓展了感性 with 理性交融的平台，构建了理论与实践连接的脉络，在给党员干部带来强烈思想震撼的同时，使党性教育在他们心

灵深处留下深深的烙印。通过红色教育基地加强党性教育，可以使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终做到政治方向不偏、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我们之所以筚路蓝缕，从战火纷飞中带领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书写一段苦难辉煌，得益于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的理想信念、严格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以及过硬的作风。通过对党的历史、革命精神的学习和对革命人物先进事迹的思考，对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的广度和深度都得到进一步加强和提高。目前，红色教育基地中简单罗列历史事件比较多，背后内涵探索比较少，对历史经验的深挖掘与新拓展需要进一步加强。如何把党的优良传统真正扎根于党员干部的灵魂深处，触及思想本质，如何讲好红色故事，体现红色智慧，弘扬红色精神，传播红色价值，还需要继续探索。传统展示手段多，现代新媒体运用少，带入感需要进一步加强。红色教育基地中党性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还不够，需要增强党性教育的体验度和鲜活度。要针对党员干部的模糊思想和错误观念，通过“把脉会诊”“对症下药”，增强党性教育的可行性和实效性。



在我们党内学习活动中，一个突出但少有人注意的特点是对撰写学习笔记的特殊重视。经过几十年传承发扬，读书作笔记已经成为党内政治文化的行为积淀。

党内最早对读书作笔记作出论述、提出要求的是陈云。1938年，陈云为了推动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探索建立了一套学习制度，撰写学习笔记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1939年12月，陈云在一篇文章中认为：“读书要作笔记。这有两个好处，一是让你多读几次，一是逼着你聚精会神，认真思索，使你了解深刻些，而不像随便看过去那样模模糊糊。”陈云不论是听讲座还是看书，他都认真记笔记。从《陈云传》披露的陈云这一时期的几十本笔记来看，学习笔记的内容极为丰富和广泛，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陈云不但自己认真记笔记，而且也严格要求与他共同学习的人记笔记。“对列席学习小组的人，陈云要求也很严格，经常检查大家的学习笔记，看看是怎样记的”。无独有偶，徐特立在1942年4月发表的《再论我们怎样学习》中，认为“读书不如抄书，全抄不如摘抄”，“节抄”“摘抄”也是作读书笔记的一种方式。当时，撰写、记录学习笔记尚属于少数个人的学习习惯和经验。

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的《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中，要求对既定学习文件“必须逐件精读，逐件写笔记”，把撰写学习笔记的个体行为扩展为全体党员的集体行为，在制度上提出了要求。

中宣部的《决定》关于“写笔记”的要求简明扼要，毛泽东对撰写学习笔记的意义赋予和明确要求则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毛泽东在半个多月后的中央学习组会议上作《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时，专门针对干部作笔记问题发表了讲话，对作笔记进行了理论提升。一是遵从党规的要求。毛泽东认为，党员必须服从党的决定，作为全党意志体现的党的《决定》有要求写笔记，党员就要坚决执行。“不管文化人也好，‘武化人’也好，男人也

好，女人也好，新干部也好，老干部也好……都要写笔记……一定要写。”二是学习态度的体现。毛泽东认为，是否写笔记体现了党员对过去错误和功劳的认识。“如果犯了错误还要装老老爷那就不行。”有功劳的人也不能把立过功作为不写笔记的理由，“过去有功劳的也要写笔记”“功劳再大也得写笔记”。三是总结经验的需要。毛泽东认为，《决定》所要求学习、撰写笔记的文件与其他著作和文章不一样，是对20年艰难困苦革命经验的总结，即使亲身经历过，也需要再深入研读才能深刻体悟和总结其中血的经验和教训。“走得再多也不行……单是走不写笔记，经验就总结不起来。”

在毛泽东的力推下，学习作笔记得到了党内积极响应。各级各部门各单位都制定了相应的制度或计划，在强化撰写笔记、检查笔记刚性要求的同时，都提出了更为具体、细化的标准和要求。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直属单位的秘书局由局领导同志负责每两天检查笔记一次，交通运输局每人作笔记三次。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要求每人每天都要作笔记。陇东驻军某旅规定每种文件读三次，作三次笔记，各班三天检查一次。一些部门和地方为促进干部更好地作笔记，采取了相关保障性、鼓励性的举措。中央总学委要求各机关要发笔记纸。《解放日报》为了指导党员干部作好笔记，还刊发了多篇关于如何作笔记的文章。吴堡县规定干部每周要学习新文字两小时，以提高作笔记的能力。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要求组长在检查中把发现的好的笔记拿出来让大家观摩。延安市和陇东驻军某旅都举行了笔记展览。

延安整风运动后，党内历次学习运动对记笔记提出明确要求成了“标配”和“惯例”。例如，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整党运动中，安东（现属吉林、辽宁）省委下发的关于在机关干部教育的决定中提出了“制定学习计划，规定两个小时学习制度，作笔记联系思想反省与实际工作”等要求。1957年6月，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理论学习的决定和中共石家庄市委关于动员开展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运动的指示，都要求“人人订计划，个个作笔记”。

史海拾贝

党内学习「作笔记」历史小考

□ 李雪梅